

015012

中共淄博地方史

第一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共淄博地方史

武中奇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共淄博地方史》第一卷

编审委员会

主任：阎启俊

副主任：张建国 邹大民 冯梦令 周继烈
王行宏 岳长志 翟纯生 刘池水

委员：明子夫 陈 勇 于文新 车 立
王莲君 郭利民 李传章 杜思勤
侯希杰 赵家洋 王希静 周继轲
刘薛生 张广海 李洪吉 牟玉章

主 编：翟纯生

副主编：陈 勇 于文新 周继轲

编 辑：张广海 杨茂常 张立民



谨以此书

向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献礼



序

中共淄博市委书记 阎启俊

太平编志，盛世修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之际，由中共淄博市委党史委主持编写的《中共淄博地方史》（第一卷）出版了，这是我市党的建设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市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又一硕果，是我们向建党 80 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值得庆贺。

淄博是山东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20 世纪初，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淄博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矿区，矿工达万人之众，成为一支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早期济南共产党组织创始人王尽美、邓恩铭等非常重视淄博的建党工作，先后多次亲自或派人来淄博开展工作；中央也多次派人来淄博进行巡视和指导。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1924 年 7 月，淄博大地上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淄博支部诞生了。她是继济南之后，山东省建立的第二个直属中央领导的支部。从此，淄博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不屈的

革命斗争,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谱写了激动人心的历史篇章。从党组织的初步创建,到大革命时期淄博各地风起云涌的工人、农民革命运动;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淄博党组织的十年艰苦斗争,到抗战爆发后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到淄博全境获得最后解放,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淄博的共产党人和党领导的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表现出了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革命气概,绘就了彪炳史册、光照后人的历史画卷。据统计,仅解放战争时期,淄博就有3万多青壮年参军,1.5万人的地方部队升级到野战部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共淄博地方史》(第一卷)以清晰的轮廓、翔实的内容、动人的笔墨,展现了中共淄博党组织自1924年到1949年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再现了全地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英雄业绩,深刻地向人们揭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党继往开来、胜利实现新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在淄博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淄博革命斗争过程中,淄博党组织也同我们党一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经历了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曲折历

程。其间，既有风起云涌的高潮，也有艰难困苦的低谷；既有光耀千古的辉煌，也有过这样那样的挫折。深刻认识党在发展过程中的曲折历史，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发展的客观规律，继续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可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

人类已经进入了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崭新的 21 世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深切地缅怀过去，热烈地憧憬未来。《中共淄博地方史》（第一卷）的出版，必将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在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畏艰难，开拓进取，开创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谱写建设淄博、振兴淄博的新篇章。

是为序。

绪 言

淄博地处鲁中，北至黄河，南接临沂、莱芜，东连潍坊，西邻济南。全市总面积 5964.4 平方公里，辖张店区、淄川区、博山区、临淄区、周村区及桓台县、高青县、沂源县。淄博疆域，历史悠久。距今约七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在淄博多有发掘，距今约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亦有数处发现。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封太公姜尚于齐地，建都于营丘。后齐献公于公元前 854 年改营丘为临淄，临淄开始以独立的行政区名出现于历史。淄川在西汉时开始设县，名般阳，至隋改为淄川。周村古属齐国于陵邑。博山建制较晚，于清雍正十二年设县，古称颜神镇。桓台殷商时属薄姑国，南宋时始设新城县，1914 年因境内有齐桓公戏马台，而改称桓台县。张店古称黄桑店，属齐之昌国，因张姓之店兴隆而得名。高青系由高苑、青城合并而成。沂源系因沂水之源而得名。“淄博”作为一个地名见诸于史，最早是在 1922 年 6 月王尽美《矿业工会淄博部发起会志盛》一文中出现的。以后，随着淄博地区工矿业的发展，逐渐引起全省乃至全国的重视，淄博地区建制逐渐固定下来。千百年来，淄博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

息，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逐步蚕食、瓜分中国，使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淄博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残酷的封建主义制度下，雪上加霜，陷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中。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淄博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展开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抗压迫、寻求解放的革命斗争。

（一）帝国主义对淄博的侵略

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了西方列强对外侵略的目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炮舰首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纷纷侵入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的深渊。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美、俄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将烟台划作通商口岸，从而大大便利了列强对山东的侵略。从此，山东亦逐步半殖民地化。初期，列强对山东的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其中尤以棉花为大宗。据1868年烟台的《海关贸易报告》记载：“山东最引人注目增加的是棉货匹头，特别是本色的漂白布和洋标布。这项货物的进口较1867

年超过 54.96 万匹，而 1867 年的进口比任何一年为大。”^①以后，外国输入山东地区的洋纱、洋白布逐年增多，其中仅 1892 年通过烟台、天津和镇江输入的洋纱就达 500 余万担。当时，淄博是山东棉纺织业的中心和重要集散地，受到的冲击自然也是最大的。由于洋货的大量输入和中国农产品的大量出口，迫使淄博经济转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破坏了淄博传统的手工式棉纺织业等民族经济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加速了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他们所完全不了解的国际市场，农民和手工业者愈来愈严重地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逐步走向破产的边缘，生活越来越贫困化了。

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到 20 世纪初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步伐在逐步加快的同时，也经历了一个从商品输出为主到资本输出为主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西方列强从资本主义变为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富饶的淄博煤田在 20 世纪初被德国所掠夺，成为帝国主义对淄博开始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标志。

淄博丰富的矿产资源，早就引起了外国侵略者的垂涎。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英国和德国的商人、旅行家凭借《天津条约》中有关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通商、游

① 引自《淄博煤矿史》第 89 页。

历、传教的规定，陆续进入淄博。1870年7月，英商马克·德珂勾结博山奸民强行购买夏家山、杓子岭一带封禁山场，凿井开采，“未为官府所允”。^①这是外国资本主义最早觊觎博山矿藏的记载。

对淄博真正造成威胁的资本侵略则是从德国开始的。1897年，德国政府以“曹州教案”为借口，出兵侵占了胶州湾。1898年3月，逼迫清政府订立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通过这个条约，德国攫取了胶济铁路修筑权以及沿线30里范围内的矿山开采权。这是我国损失矿山主权的起点，也是我国矿区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重要标志。从此，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淄博地区的矿藏随之遭到了掠夺。

为了掠夺淄博的矿产资源，早在甲午战争前，德国就设立了德华银行组织对华投资。不平等的《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后，德国政府便开始组织国内垄断资本，成立有关机构，为修筑胶济铁路及开采沿线矿山而进行大规模投资。1899年6月14日，山东铁道公司成立；同年10月10日，山东矿山公司成立，即“德华矿务公司”。1900年3月，德华矿务公司与山东地方政府签订了《山东矿务章程》（又称《华德矿务章程》），使其攫取的采矿特权进一

^① 引自同治九年六月初八总署收山东巡抚丁宝楨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第2册，第902~903页。

步取得了保证。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其中在淄博境内铁路干线69公里。为了掠夺淄博的煤炭资源，1903~1904年，德国又修筑了张店至博山的张博铁路39公里、淄川至洪山的淄川炭矿支线6.5公里。这些铁路完全由德国人经营，不仅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而且成为吮吸中国财富的血管。1905~1913年，德国通过胶济铁路运货、运客，共获利润1950余万元。

作为经济掠夺的重要职能部门——德华矿务公司成立后，即开始地质调查，重点对淄川、坊子两处煤矿进行勘察。1902年，在淄川南铺庄使用机械打下第一个钻孔，以后又在洪山钻探。1904年6月，在淄川大荒地（现淄川区洪山镇）打出第一口竖井，定名为“淄川竖井”，淄川煤矿建成。1910年6月，又在矿区开凿第二口竖井，定名为“海特尔井”（今寨里煤矿北大井）。当时，德国在坊子也建立了煤矿公司，但由于坊子煤矿在开发阶段就连续发生事故，造成投资闲置无法正常生产，于是德华矿务当局决定重点开采淄川煤矿。1911年，在淄川开凿的第三口竖井建成后，不久便将坊子安尼竖井的设备运至洪山。这样，德华矿务公司自1904年6月至1914年11月，对淄川煤矿累计投资623万马克。淄川煤矿成为同期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重点煤矿之一，其产量仅次于开滦和抚顺煤矿，居全国第3位，不论是机械化程度还是资金规模及煤产量，在全国煤矿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

1904年至1913年，德国从淄川掠取煤炭190余万吨。

自1904年起，德华矿务公司又在金岭进行钻探，发现有丰富的铁矿资源，随即设立了金岭铁矿事务所。1911年7月，德国取得了对金岭铁矿的绝对开采权后，迅速扩大投资规模，还计划在青岛沧口修建炼铁炉，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此外，德华矿务公司还在张店以东的湖田石矿开采石料，运往青岛供其建房、建港和修建军事设施之用，估计年开采量在百万吨之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8月23日，日本借口“英日同盟”正式对德宣战，梦想取代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日军首先抢占胶济铁路，封锁胶州湾，后又接管了淄川、坊子煤矿和金岭铁矿。从此，淄博人民又陷入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之下。

淄川煤矿在日本军事侵华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日军侵占伊始便集中全部物力、财力扩大淄川煤矿的开凿，把该矿紧紧控制在自己军事机构的直接管理之下。同时，为扩大煤炭资源掠夺，自1916年始，在日本政府的纵容、保护下，大批日商涌入博山矿区进行大规模投资。1918年，日商对博山32家煤矿有投资关系，投资达60余万元，1920年增加到数百万元以上。大量的资本输出，使日商攫取了大量民营煤矿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加强了经济掠夺。从1914年至1922年的8年间，日本对淄川、博山的煤矿进行掠夺性开采，共掠取煤炭近400万吨。

与此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形形色色的日本商人、财阀、浪人等纷纷涌进淄博，进行各种经济扩张活动。在张店、辛店、淄川、博山、周村等地，日本商人大量收购黄烟、蚕茧和棉花。他们操纵价格，垄断市场，严重破坏了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如设在张店的铃木丝厂，使无数蚕农受害。在周村，日本商人涌入商埠区^①开设洋行、公司、店铺，经营丝、麻、棉、医药、杂货等。甚至有些日本商人还贩卖毒品（鸦片），毒害淄博人民，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这些日本商人建立行业组织“仁会”，依靠日本军方势力夺取经营特权，不断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在博山四十亩地，日本人还设立了领事公馆，直接办理日本侨民的有关事务。他们在领事馆周围设立烟馆、妓院、赌场，中国官吏与警察不得入内执行公务，俨然成为日本人的“租界”。

伴随着帝国主义军事、经济的入侵，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也时刻没有停止。鸦片战争后，德、英等国的传教士纷纷来到淄博，先后在周村、淄川、张店、博山、桓台、临淄建立教堂。到20世纪初，淄博各地教徒约有2000余人，其中仅淄川就有1000余人。这些教会打着传教之名，行精神侵略之实，甚至依靠帝国主义的军事支持，建起了自己的教会武装，欺压当地百姓。教会势力成为帝国主义

^① 清政府于1905年宣布周村为商埠，并将方圆1000亩地划为商埠区。

在淄博的一支特殊力量。

随着帝国主义对淄博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逐步加强，淄博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

（二）淄博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淄博各地的社会经济自古以来就各具特色。如淄川、博山的煤炭开采业、陶瓷琉璃业，周村的丝绸、商业以及临淄的棉纺业等各有所长。虽然近代以来，由于外国势力的人侵，破坏了淄博地区原有经济秩序，民族工业、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冲击，然而勤劳智慧的淄博人民面对内外双重压迫，顽强抗争，逐步接受先进的生产方式，使淄博各地的民族经济仍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淄博工商业从手工作坊式向近代化转折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19世纪60年代，清朝中央和地方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僚，在与西方列强的接触中，逐渐认识到“师夷长技”、“求强”、“自新”才能把握巨变之世。于是，他们先后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人才，兴办了一批军事、民用企业，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

资源丰富的淄博，成了山东洋务派施展抱负的大好天地。1887年，山东巡抚张曜在淄川苏家堤开办了淄川煤矿，后又在李鸿章支持下开办了淄川铅矿。这是在淄博开办最早的洋务企业。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允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同时也刺激了中国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

的发展。1904年，山东巡抚胡廷干、直隶候补知府顾思远等人创办了山东第一家机器玻璃工厂——博山玻璃公司。该公司1907年建成投产，厂址在今博山柳杭村。之后，山东工艺局局长黄华又主持创办了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该所招聘了大量当地的能工巧匠，从景德镇引进技工，并对陶瓷原料、生产设备、制作工艺进行了改进。

洋务运动和官商合办企业，由于带有深深的封建主义烙印，无法适应近代化机械生产的要求，因而这些企业大都因管理不善、亏损严重而倒闭。但它们的兴办却带来了西方机器生产的生产方式，更新了人们的观念，刺激了私人兴办工矿业的欲望。1903年，清政府商部颁行的《公司律》，更是从法律上促进了新式企业的兴办。此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淄博产生了第一批民族企业，一度出现了采煤、琉璃、丝织等行业民办工厂的热潮。

采煤业 淄博采煤的历史较早，唐宋时期就已初具规模，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工场式矿井。近代，由于外国侵略使民间采煤业受到冲击，淄博人民开始不断进行收回矿权的斗争，发展民族采煤业。如德国抢占了淄川煤矿后，山东和淄博的绅民经过斗争，迫使德帝国主义签订了《收回山东省各路矿权合同》，博山、淄川的部分矿权被收回。当时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家王怀祺，在淄川开煤井数十眼；张平三在龙泉一带开煤井数眼。还出现了一批近代煤矿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帝国主义因忙于战事，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这一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给淄博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时期。1911年，博山商人邹因陈创办了淄博第一家电力企业——博山电灯公司，带动了淄博电力工业的兴起。此后，各民营煤矿纷纷安装发电机，设立发电所。其中吉成、大成等6家煤矿公司创办了博山矿业联合发电厂，将电力用于采煤，还试用割煤机、冷风机、电动凿岩机等新式机械。据统计，1910~1920年新开办的民族煤矿有：博山矿区的吉成、信成、玉合、天成、泰兴、振业、华东、悦升，以及淄川矿区的玉生、义和、万祥等10余家煤矿公司。到20年代，淄博民族煤矿发展到40多家，矿井110多个，机器100多部，年产煤100万吨以上。这时，淄博煤矿已发展成为全国三大矿区之一，煤产量1914年占全省的57.94%，1915年占62.87%，1916年占61.33%，1917年占62.63%。

玻璃业 博山仍保持了玻璃之乡的地位。胡廷干等创办的琉璃公司虽然停办，但先进的生产技术却在博山得到了传播，出现了多处玻璃生产厂家，其中生产平板玻璃的有10余家，年产7000余标准箱；玻璃器皿生产厂家150余家，著名的有启明玻璃公司、人和玻璃公司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博山的玻璃工业又有了长足发展，最盛时玻璃制品年销量达1.3万吨。